

第一
辑

书
房
臆
话

呼唤“中国骈文史”

半个多世纪以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中国文化史丛书》。其中有一本刘麟生著的《中国骈文史》，是用文言文写的。全书提纲挈领，要言不烦，为我国骈文的发展脉络勾勒出一个简明的轮廓。但内容不够详尽，观点当然更谈不上新颖，距一部完善理想的、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水平的骈文史还有不小差距；不过也不应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那个时代的著作。近二十年，虽有一两部谈骈文的专著出现，水平都不很高。因而有必要为此而大声疾呼，我们应该早日出现一部面貌崭新的“中国骈文史”。

回顾一下近五十年来，或者更远一点上溯到“五四”时期，应该承认，我们在中国文学史方面的研究工作，既有向新领域方面拓展的功绩，也有由于对原有传统文化的认识不足而造成偏枯乃至畸形的局面。自“五四”时期人们攘臂痛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从而大张挹伐开始，骈体文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范畴中便大大受到冷落。岂止冷落而已，甚至还被当成反面的、消极的，只能受到批判的一个文学品种。这是十分不公平的。当然，同罹这种灾难性命运的文学作品不止骈体文一种，这就使我们的万紫千红的几千年的文学传统的发展在短短不足百年中失去了平衡，从而导致某些文学品种一蹶不振乃

至濒临灭绝。正如自然界的某些稀有动植物一样，如不再加以珍惜培育，迟早会从我们地球上完全消失的。

说到我国的骈体文，姑不说在先秦古籍（包括经、史、子、集各个门类）中早已存在着骈偶对仗的修辞现象；即从两汉以后，正式的骈体文逐渐形成的轨迹来看，它不但充分体现了汉民族语言文字“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明显特征；而且就其本身的句型结构而言，也同我国诗歌发展的关系密不可分。《诗经》以四言句式为主，《楚辞》以六言句式为主，而构成骈体文最主要的句式正是四言和六言，即所谓“骈四俪六”，这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骈体文艺术形式的核心部分是从《诗》、《骚》发展演变而来的。但骈体文的句型并不限于四言和六言，骈体文的功能作用更不是传统律诗中五、七言颔、颈二联的对仗形式所能包括和替代的。总之，我们对于具有近两千年传承历史的骈体文还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至今仍停滞在对它表面现象作浮光掠影地笼统批判或干脆一笔抹煞的阶段。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中的一片空白或一大漏洞。

关于研究骈体文的文献资料，人们首先会想到《昭明文选》。由于《文选》成书较早，其中没有收入六朝以来集骈文大成的庾信、徐陵的文章。作为选本，清人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可以略补《文选》之不足。骈体文到了唐代是仍旧向前发展的。“初唐四杰”的成就并不限于诗歌，他们创作的骈体文似更有承先启后的历史意义，其影响窃以为应在张说、苏颋（所谓“燕许大手笔”）之上。唐人对骈体文的实用价值不但有所认识，而且在创作实践中更使这种文体的美学特征日益显现并逐步提高。刘知几的《史通》，陆贽的《奏议》，是唐代骈体文中两枝奇葩。人们都把韩愈、柳宗元看成唐代古文运动的两

面旗帜，而他们却同样能写精严谨饬的骈体文。晚唐的温庭筠、李商隐，不仅是大词人、大诗人，他们的带有抒情内容的骈体文也同样不朽。

在宋代，以应用为主的“四六文”大兴于时。“古文八大家”中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写的“四六文”不仅在当时脍炙人口，即使到今天，读来也足以令人钦服。我在北大历史系任课时，有一年准备开一门《唐宋历史文献选读》，邓广铭先生便嘱我多选王安石和苏轼的“四六文”。后来因为需要开必修课《中国文学史》，这门课终于没有讲成。“八家”之外，宋代能写骈体文的作家大有人在。如果有人认真编写中国骈文史，是不愁无话可说的。

有清一代是古典文学“回光返照”的时代。不仅诗、词和散文（以“桐城派”为代表）有了新成就和新面貌，骈体文也一度“中兴”。清初有尤侗、陈维崧；乾嘉以还，经学家如汪中、洪亮吉、孙星衍、孔广森，辞章家如吴锡麒，乃至提倡“性灵”派的诗人袁子才（枚），他们的骈文创作都有相当成就。汪中的《哀盐船文》，袁枚的《于忠肃公庙碑》，是一时脍炙人口的上乘骈文佳构。当时的经史学家和古文作家，很少有不会写骈体文的。直到晚清的李慈铭、张之洞、樊增祥，都是骈文高手。只是我们近年来若干种的《中国文学史》专著，往往对此视而不见。今天回头一看，真是咄咄怪事。

骈体文对唐宋以来的古文也发生过影响。“八大家”中不少好文章都体现了“破骈入散”或“散中寓骈”的特色，特别是韩、柳、欧、苏，都善于融合骈散两种文体之长。清代桐城派盛行后，以恽敬、张惠言为代表的“阳湖派”，其作品即吸收了骈文的特点而以清新明润的面貌出现。由此可见，骈体文

本身的发展规律固宜仔细研究，而骈文与诗歌散文彼此间的关系与影响也应进行探讨。然则呼唤“骈文史”的早日写成，就更属当务之急了。

原载 2000 年 6 月 9 日《人民政协报》

呼唤一部理想的 “近代文学史”

撰写此文有远因近因各二。远因之一：根据过去我教中国文学史的经验，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即所谓“近代文学”阶段，在课堂上只是一表而过，讲授极为草率。有时因课时不足，干脆一字不提。做为教师，我一直感到遗憾。远因之二：即使课堂有时间讲授，内容亦多偏颇，观点尤欠正确。许多应该提到的作家作品，被扣上一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帽子，便无端一笔抹杀。讲近代诗歌，从龚自珍一下子就跳到秋瑾；讲谴责小说，连《孽海花》和《老残游记》讲起来也吞吞吐吐，若即若离；讲文艺理论，最多批判一下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至于戏曲，因过于看重剧本文学，便搬出一个演过个人本戏的汪笑侬来。至于散文，则根本无一席之地。其内容之偏枯与数量之稀薄，实与这个转型期的时代太不相称了。所以从我个人的愿望来说，我很早就盼着有一本具有科学性的、内容翔实的“近代文学史”能够问世。

近因之一：自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情况已大大改观。在学术界，近代通史、文化史、思想史、政治经济史的研究正在逐步展开，且不断拓宽与深入。一时岐嶷杰出的风云人物也已陆续浮出水面，“改良主义”的帽子早已制约不住那些对国

家、对时代确有贡献的志士仁人。可是，近代文学史的研究步伐与成果却显然跟不上发展形势，对比之下实在是相当落后了。做为一名教书匠，真诚希望有人急起直追，赶紧动手写一部理想的“近代文学史”以弥补不足。近因之二：今年十月，在福州召开近代文学学会的年会并对这一阶段的学术问题进行研讨。我因故无法出席，只能写此小文一表个人心愿。 乌莛之言，或不为大雅之士所弃也。

谈到撰写近代文学史的内容，姑仍以诗词、散文、小说、戏曲和文艺理论这五个方面大致划分一下，略陈个人一孔之见。先说诗词。除了启蒙时期的林则徐、龚自珍，以及稍后提倡诗界革命的黄遵宪（包括梁启超）之外，“同光体”这一特定的（但又比较松散的）诗歌流派确应投入力量认真研讨。而过去人们对同光体诗人及其作品，几乎没有几个人认真阅读过，只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地批判几句，仅用“封建遗老”这顶桂冠便把一大批作家作品轻而易举地从文学史中“扫荡”出去。即如陈三立、沈曾植直至三十年代初逝世的黄节，除了他们写诗的艺术成就值得研究借鉴外，其诗中的爱国思想与忧患意识，至今犹足令读者掩卷深思，盖“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在词的领域中，文廷式、朱祖谋等，与陈、沈诸家正属同工而异曲。谈到近代散文，由曾国藩所倡导的所谓“桐城派”古文的中兴，仅从王先谦编选的《续古文辞类纂》中便可发现不少足以传世之作。此外如以严复、章炳麟为代表的先秦汉魏体散文，以张之洞、王闿运为代表的骈四俚六体（这在“五四”时期统名之曰“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直到鲁迅早年写成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在当时都发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如果我们参考一下钱基博写的《中国现代文

学史》，就会发现从晚清到民初有多少作家和作品都被人们忘掉了。关于小说，除侠义公案、谴责小说外，还有苏曼殊的传奇小说，林纾的翻译小说，以及大批涌入市民读者眼中的所谓“鸳鸯蝴蝶派”之作（依魏绍昌先生归类，未免失之太泛，其中包括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狭邪小说和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世情小说，并非全属鸳鸯蝴蝶派）。其中诚不免精糟并存，鱼龙混杂；但做为专门研究课题，就我所知，在美国的哈佛和德国的海德堡，以及其他欧美各个汉学研究中心，均有人已经或正在进行研究探讨，而我们对此却往往掉以轻心，视而不见。在我们今天的文坛上，只纠缠于张爱玲、金庸等人的作品够不够进入新文学殿堂的资格，算不算文学的主流，却很少有人去追本溯源，看看这些当代作家与近代文学发展有无传承关系，研究一下其间的来龙去脉。至于近代戏曲，窃以为不能仅局限于有文本可稽的书面作品，而应考虑到自南戏、诸宫调、杂剧、传奇以下的戏曲与说唱文艺间的交互关系，考查一下它们与今犹“健在”的全国各种地方戏（包括昆曲、京戏）的传承脉络与演进轨迹，并对演员流派史、剧目演出史乃至音像文献资料的挖掘与保存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不宜听其自生自灭。说到“文论”，我希望有识之士能把林（纾）译小说若干篇书前的序言拿来与“五四”发难时期陈独秀、胡适诸家所标榜的各项文学主张和意见进行一次详尽深入的梳理和分析比较，看看两者之间到底有无脉络可寻。夫周作人晚年当了汉奸，而研究者们尚且为他“五四”时期的贡献与成就评功摆好；林纾晚年是封建顽固派，难道就不能为他前期所阐发的进步文艺观做一点调查研究的工作吗？至于诗话与词话，则有《石遗室诗话》、《人间词话》和《词话丛编》在，我就不再一

一列举了。

总之，近代文学的各个领域中，可写可评、歌可泣、可广为宣扬并使之流传久远的作家作品实在太多，非此小文所能囊括。姑举一反三，供有志撰写《近代文学史》的专家学者参考。

原载 2000 年 12 月 8 日《人民政协报》

杨向奎先生的三册遗著

杨向奎先生（1901 年－2000 年）字拱辰，祖籍河北丰润，是我国当代史学界著名学者。依年齿算，他应是我的师辈。我很早就读过他的文章，但从不相识。八十年代中期，拙著《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在《学林漫录》（中华书局出版）连载。忽接杨老来信，除对拙作有溢美之词外，还详述了他本人当年在北京看戏的经历，并对当代某些著名京剧演员（包括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等艺术大师）做出迥异时流的美学评价。于是我同杨老通过几封信。可惜的是，我因搬家竟把一批信件遗失，杨老的手札亦在其内，十分遗憾。九十年代初，杨老及门弟子集资准备出版《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老人坚嘱我写一篇专门谈京剧的文章收入其中。我谨遵长者之命，把在旅德讲学时所写的一组有关京剧的读书札记寄奉，此后便没有再与杨老通信。公元 2000 年，意外地收到杨老的学生吴锐君寄来的杨老大著三册。一册《杨向奎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 月出版，是杨老口述，由弟子笔录的；一册《杨向奎学术文选》，人民出版社同年 1 月出版，共收选文十六篇，涉及经学、哲学、史学考证、回忆师友及对他们著作的评论以及自然科学论文诸多方面，最后一篇是大会发言，题为《我对人文科学的看法》。还有一册是旧著重印，乃杨老早

年著名论文《两汉经学与政治》。此书原由独立出版社发行，1945年12月初版；至2000年5月重印珍藏本三百册，我收到的这本编号是第229册，足见作者对此书的珍视。接到书后，还未及写信向杨老致谢，吴锐君又来电话，告以杨老因病逝世的不幸消息。这实在太突然了。当时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杨老这三册遗著仔细读完，并记下学习心得。杨老逝世后，我已写过两篇悼念短文。现在这三部遗著总算通读了一过，今再写此文，作为对杨老的追思。

《学述》是杨老最后遗著，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学谱。它总结了杨老治学和为人的全过程，读此书可以对老人有个虽然简括却比较全面的了解。杨老是顾颉刚先生的学生，从《学述》第二章《顾先生引我走上治学之路》所叙述的内容来看，杨老不仅追述了当年从顾先生受业的经过，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老师指引提携的深厚情谊（这在《学述》全书中曾流露多次）。最近读《文汇报·新书摘》（2001年4月1日）专版，看到它摘引的一本名书《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的专著。这篇引文中在提及童书业撰文批判顾先生的同时，说杨向奎先生亦曾撰批判文章，题为《“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并引述顾先生的日记，谓童杨两文“均给予无情之打击”（小如按：时间大约在1952年），但到了1954年5月，顾先生已表示对他的弟子们有所宽容和理解，十分肯定地说：“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此事在《学述》中虽未提及，但从全书行文的感情与态度来看，杨老直到晚年对顾先生的情谊不仅未“划清界限”，而且相反，他始终对顾先生感戴有加。我没有读过《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原书，不知书中所叙顾、杨二老关

系如何。但从五十年代以来，举凡“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对胡适、俞平伯的所谓学术批判、反右派、“双反”及“拔白旗”以至于1959年的“反右倾”，直到十年浩劫，这些惊心动魄的无情风浪，我本人都曾亲身经历过。尽管自己也写过几篇批判别人的文章，但更多的是挨批挨整。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的历次运动，并重新翻读一些批判文章，包括顾颉刚先生批胡适，童书业等顾门弟子的批顾，还有童门弟子的批童，以及大量对胡适、俞平伯等先生的批判文章专辑，我乃发现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客观的大气候硬逼着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学术批判文章中纷纷发表违心之论和欺人之谈，不惜“从鸡蛋中拣骨头”，昧着良心说假话，乃至说谎造谣。不过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质与量的程度上的差异而已（通过这种程度上的差异也可窥见写文章的人在人品上的善恶高下）。我本人就先后写过批判孙楷第和程千帆两位先生的文章。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剧，而且是整个民族、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悲剧。这就是我在读《杨向奎学述》及《文汇报·新书摘》之后一个重要的体会。明乎此，则有些人际间的恩恩怨怨自然可以不去认真计较了。不过话说回来，有些非清算不可而至今犹未进行清算的账，恐怕迟早还是要清算之日的。

话再回到本题。把杨老的《学述》和《学述文选》结合起来，边读边梳理，就会发现杨老平生治学的方法和途径，可以用他本人的话来作一总结：“……研究中国古代史，不仅需要历史文献与考古发掘的双重证据，而且需要民族调查的三重证据”（《学述》第31页）。在科研实践中，杨老也确是这样做的。不仅对中国古代史，即对经学、哲学、文化史和自然科学，杨老也基本如此。如他曾“两次去曲阜孔府探‘宝’”，便

是他进行民族调查的实践。而从他早年对“防风氏”的研究，直到晚年对曹雪芹祖籍的考证，其“道”是“一以贯之”的。这篇拙文并非书评，恕不一一具体举证了。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杨老早年的论文《两汉经学与政治》。这篇专著初一问世，即受到学术界好评，杨老本人对它也比较看重。其中创见很多，我只想举出首尾两点。一、“五德终始”之说与政治的关系是顾颉刚先生首先提出的，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一般人都根据《史记·孟荀列传》，认为此说肇自阴阳家邹衍、邹奭。而杨老独具慧眼，判断“五德”之说始于“思孟学派”，即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和他的再传弟子孟轲。至于邹衍，原亦附丽于儒家，后来才自立门户。这一点可以说发前人所未发，而不论从文献资料推断，还是从学术传承关系来看其发展轨迹，都是言之有据的。二、西汉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以来，终西汉之世都是“今文学派”独踞权威地位，不仅左右学术，而且影响政治。自刘歆力排众议，提倡“古文经”（以《左传》、《周礼》为主要文献）；“五四”以来，人们的看法大都依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说，认为这是刘歆欲助王莽篡位，才伪造古文经籍；及王莽夺得统治权后，又果然复《周礼》之古，来定官制、治天下。这几乎已成不争之论。而杨老此书从实际出发，研究王莽所推行的一套治国办法，却受了不少“今文学派”影响，有不少内容还是从董仲舒所垄断的“今文家”之言那儿裨贩来的。这就很值得认真研究探讨了。这实际上已把康有为诋毁刘歆的那一套臆说彻底推翻了。当杨向奎先生从顾颉刚先生受业时，连傅斯年也认为杨先生是“顾派”，这在《学述》中曾明确提到。但我认为杨老的作学问，是有他自己特点的，即他虽运用“古史辨派”疑古的治学方法

对古史进行分析批判，而其目的却是为了证明古史到底有哪些是信而有徵的，其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与“疑古”派相反或相异，而其最终理想乃是从另一角度还历史以真实面目。所以杨老对自己的史学研究并不承认完全是“顾派”，尽管如杨老本人所说，他之从事学术研究确是由顾先生引进门并走上一条终身寝馈以之的道路的。我在另一篇纪念杨老的小文中已提到，师友间学术上的不同见解与彼此间深厚的情谊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即使见解不同，而始终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正是老一辈学者的不可及处，也是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学习的优良作风和传统美德。

附带还想谈一点意见。最近读到北大历史系陈苏镇君新著《汉代政治与春秋学》（2001年3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对两汉经学与政治的关系叙述得很详尽，观点亦平妥纯正。但我发现，陈君显然没有读过杨老的《两汉经学与政治》这本书。从吸收前人学术成果这一点看，陈君似乎还搜罗得不够周备。同样，我读到今年《中国文化》第17、18期合刊上所发表的王水照君的《陈寅恪先生的宋代观》论文，王君似乎也没有读王永兴先生的专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治学问当然无法遍览前人著述，但于有影响、有分量、带有权权威性的前人专著总该留心搜求，还是一个不应缺少的步骤。愿与同行们共勉。

2001年4月

原载 2001年8月70 《人民政协报》

文化“稀释”现象

很久以来就想写一篇这样的文字，却迟迟没有动笔，主要是自己对这种现象的得失评价没有把握。经过两三年的观察了解，发现“稀释”现象在文化领域中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不揣冒昧，姑妄一陈鄙见。

我是教书匠，久居高校，还是先从研究生的论文谈起。记得当年王瑶教授曾公开宣称：“研究生的论文超过两万字我就不看。”九十高龄的林庚先生，退休前指导博士论文，也力主文章篇幅要尽量简短。这都是有案可查的。曾几何时，我乃发现硕士论文有的已难控制在几万字以内，而博士论文则至少要十多万字才算“达标”，有的竟多达甚至超过二十万字。我想，如果让我这老朽重做冯妇，回过头去充当研究生，单凭写文章凑不够篇幅便无法猎取学位。所以我常说，我连拿“学士”学位恐怕都不够资格。

仔细分析一下，研究生论文是否有必要写得如此冗长，确是个应当认真对待的问题。我试举一个近例。今年暑假前有一位要毕业的博士生，他写的论文我曾看过三遍。第一遍是草稿，第二遍是初稿，第三遍是定稿。我根据其定稿提出修改意见，改完后因时间紧迫我未再过目。但确切知道他一直努力在拉长他的论文，最后总算达到官方所要求的长度，大约有十几

万字吧。而这位论文的撰写者在他修改和同我讨论的过程中，始终为文章的字数不足而发愁乃至非常痛苦。万般无奈，他就在列举足以证明其观点的事例（其实已不是举例，而是把所有的原始资料全部罗列于论文中）和文末所附的注释条目上打主意凑字数，终于把清稿打印成厚厚的一本，才得以“过关”。但我认为，这篇论文写得还是不错的，因为作者只在阐明自己观点的基础上拼命堆砌材料，还没有为凑字数而东拉西扯、东拼西凑，用稗贩他人已发表的文章内容来填满篇幅。近时每有揭露性的文章见诸报端，说某甲的论文是抄袭了某乙、某丙和某丁的。究其实，有的文章还并不是完全抄袭，某甲原也有他本人的见解；只是苦于字数不足，才不得不东摘一段，西引一段，把某乙、某丙乃至更多的现成文字过录进来，以达到写论文的数量要求。这种不必要的扩大篇幅，即我所谓的“稀释”现象，亦即人们说的“水分”太多。至于专门靠抄袭拼凑他人著作来做为自己劳动成果并公开出版的，那要比上述情况无耻得多，已构成侵权犯罪，实际上不仅是“稀释”而已，而是专门制造文字垃圾了。

论文篇幅无限度拉长，实际是受社会风气影响，不过“水涨船高”而已。这有每天出版的各色报纸为证。由于报纸的广告篇幅必须与文字版面成适当比例，为了增加广告以便多赚钱，乃不得不拼命加大报纸篇幅。有的报纸，原来每天只出八版，目前却动辄加大到三十二版乃至四十八版，看上去花里胡哨，五彩缤纷，仔细看过，却找不到多少有实质性的东西。有的新闻报道，标题往往用特大号铅字铺满半个版面，而内容不过寥寥数语。有的所谓副刊只有三五段简短文字，剩下的版面却被大而无当的广告铺天盖地占领。看起来辉煌夺目，读下